

计划生育政策 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感的吗^{*}

——80后一代视角的研究

王伟 景红桥 张鹏

【内容摘要】针对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我国居民幸福感的问题,使用兄弟姐妹数量代理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在CGSS2008数据的基础上从80后的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发现:(1)80后居民的幸福感受兄弟姐妹数量增加而显著降低;(2)在兄、弟、姐、妹中,哥哥数量是幸福感降低的最重要因素;(3)对于46~55岁的中老年人来说,孩子数量减少并没有降低其幸福感。在我国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相对稀缺的现实下,计划生育政策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我国居民的幸福感受。因此,未来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应当着眼于提高人口质量、促进性别比例平衡,这样不仅能有效应对老龄化及劳动力供给减少问题,更有利于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受。

【关键词】计划生育;80后;幸福感;兄弟姐妹数量

【作者简介】王伟,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博士研究生,天津:300071;景红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博士研究生;张鹏,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Doe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Reduce People's Sense of Happiness? A Post-80 Generation Perspective

Wang Wei Jing Hongqiao Zhang Peng

Abstract: Drawing upon data from the 2008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on people's sense of happiness, with the number of siblings as the proxy of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effect. Research finding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sense of happiness of the post-80 generation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siblings; (2) Among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 number of the elder brothers is the most prominent determinant in reducing the sense of happiness; (3) As for the middle-aged and older people,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the context of scarcity of educ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resources,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has enhanced rather than reduced people's sense of happiness. Hence, future adjustment of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could further improve people's happiness by addressing gender imbalance, ageing and decreasing labour supply.

Keyword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Post-80 Generation, Happiness, Number of Siblings

Authors: Wang Wei, Jing Hongqiao and Zhang Peng are PhD Candidates,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Email: wangwei0526@yahoo.com.cn

*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批准号:71141012)“人口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资助。

1 引言

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成功地控制了我国人口的增长率,由1970~1980年间的17.4%下降到2000~2008年间的6.0%。但是,伴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中国“未富先老”的现象开始浮现(王诚 2005;蔡昉 2010),社会开始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正确性,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是导致中国社会老龄化加速、养老压力巨大的重要原因,降低了居民的福利水平从而导致幸福感下降,但是事实确实如此吗?

80后是受计划生育冲击但业已长大成人的一代,在80后的独生子女们构建的家庭中,一个家庭需要赡养四个老人与一个孩子,“上有老下有小”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80后家庭面临着严重的抚养压力。同时,亲兄弟姐妹之间具有与其他关系难以比拟的血缘关系,而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独生子女却因此缺少这种血缘之情。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显著降低了80后独生子女的幸福感知。

计划生育政策诚然有其不足性,但另一方面,在我国当前资源依然非常紧缺的情况下,独生子女往往能够获得更好的成长机会。由于家庭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孩子数量通常未达到合意的水平,因此父母会更加重视孩子的质量,这会促使父母给孩子提供比较好的生活条件以及更加重视孩子的培养等等。由此可见,计划生育下的80后独生子女幸福感知可能并没有降低反而会有所提高。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增加了80后的养老压力、减弱了兄弟姐妹之间的血缘亲情关系网,进一步影响到居民的幸福感知,但是提升了孩子可获得的资源,这一点却又提高了居民的幸福感知。张学志和才国伟(2011)认为,增加国民的幸福感知才是以人为本政策的必然追求,因此计划生育政策对80后幸福感知的冲击究竟如何呢?本文拟使用2008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以尝试解开这个谜题。

2 文献综述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李建新(1996)系统地归纳了七、八十年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认为我国就控制人口的生育政策而言,经历了起步、紧收、调整和稳定四个阶段,由1971~1979年间的“晚、稀、少”政策过渡到1980~1984年的“一孩”政策,进一步到1984~1986年间为适应农村当时状况的“开小口”政策。周俊山和尹银(2011)的研究显示,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初,1971年7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51号文件,明确号召在全国城乡普遍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这可以看做是中国政府大力推行具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开端;至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新修改的《宪法》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从法律上保证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地位。王丰和梅森(2006)则描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变更,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于1980年正式出台,1984、1988年又对其进行过修正,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允许有条件地生育两个孩子。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方式有了明显转变,从完全依靠行政手段转移到侧重提供服务。

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性如何呢?Bongaarts and Greenhalgh(1985)认为,在不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形下,至2050年中国人口将增长至24.08亿,而如果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2050年人口仅有9.17亿,计划生育政策可以大幅改善我国人口过多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Li(1995)通过研究1979~1988年间河北省的人口状况,发现严格的生育配额政策的有效性很差,人口政策虽然明显影响了有工作妇女的生育率,但是在农民妇女中的执行程度却很差。Yang and Chen(2004)则使用1992年国家生育力调查报告分析了1970~1989年间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动,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城镇与农村的影响截然不同,整个70年代妇女初婚的年龄持续上升了1.61岁,农村妇女初婚年龄为23.09岁,比城镇与城市妇女分别低1.19与2.02岁;农村妇女首次生育年龄由1970年的22.63岁上升至1979年

的 24.05 岁,随后下降至 1989 年的 23.55 岁,城市与城镇妇女首次生育年龄分别比农村高 1.99 与 1.20 岁;而对于总出生率来说,70 年代城市、城镇与农村的总出生率分别为 2.26、2.57、3.43,到 80 年代该指标则分别降至 1.32、1.63 与 2.49。由此可见,计划生育政策成功地通过控制出生率而控制了我国总人口的增长。

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可以显著地降低人口出生率进一步控制人口总量但是同样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如 Bongaarts and Greenhalgh(1985)认为计划生育政策破坏“家”的概念,降低居民的存在感、家庭的养老能力以及东亚增长模式中发挥重大作用的人口红利的贡献;Chu(2001)则指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仅允许一个家庭生一个孩子,中国居民尤其是农村“传宗接代”理念对儿子的偏好以及堕胎经济成本的降低导致了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调,在 1981 年每出生 100 个女孩则对应出生 108.5 个男孩,但是到 1989 年该数量则上升至 111.3。Ebenstein(2010)发现这种趋势在近些年进一步扩大,在中国 15 岁以下的儿童中男孩的比例超过女孩高达 13%,Edlund et al.(2010)认为上述性别比例失调是过去 20 年中国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导火索。

虽然计划生育政策有一定的不利影响,但是出生孩子数量的减少使得我国人力资本由“量多”向“质优”转化,Rosenzweig and Zhang(2009)使用是否双胞胎代理家庭受计划生育政策约束的程度,通过研究中国双胞胎与非双胞胎之间的差异,发现孩子数量的增加显著降低学业进步、进入大学的机会和学习成绩,并会影响所有孩子的健康程度。因此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孩子数量的减少带来了孩子质量的提高,即数量-质量平衡(quantity-quality trade-off),计划生育政策虽然降低了人口数量但是并不一定会降低中国的人力资本。

3 数据与变量选择

在以上学者的研究中,仅仅指出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养老压力增大、人力资本由量向质转化以及犯罪率提高的重要原因,但是并未涉及到直接影响社会和谐和居民幸福感,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计划生育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分析。本文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2008 年 10~12 月进行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由于我国 1980 年代开始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从兄弟姐妹数量的角度来说,80 年后出生的居民是受计划生育政策冲击较大的一代,同时相对于在样本调查期间即 2008 年广大的 90 后居民尚未成年且样本数据非常少,因此本文选取了 80 后即在 1980~1989 年间出生的 999 个居民作为样本,并设定回归方程

$$\text{Happiness}_i = \alpha_0 + \alpha_1 \text{siblings}_i + \beta X_i + \varepsilon_i \quad (1)$$

其中 Happiness 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幸福感,siblings 为主要解释变量兄弟姐妹个数, X_i 为其他控制变量。参照前人的研究,我们选择性别、教育程度、是否少数民族、是否信仰宗教、是否党员、户籍、健康程度、婚否、是否有房、是否有工作、家庭平均收入与家庭相对经济状态为本文的控制变量,具体描述如下:

3.1 被解释变量

幸福感(happiness):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居民幸福感来自于调查问卷的第四部分问题 3“总体来说,您觉得您快不快乐?”更改为相比居民根据对这一问题的赞同程度,在“很快乐、还算快乐、普通、不太快乐、很不快乐”五个答案中做出选择,我们认为在此“快乐”的概念等同与 CGSS2003、CGSS2005 调查中的“幸福”,并且将“很不快乐”至“很快乐”五个状态依次定义为数值 1~5,即很不快乐为 1,很快乐为 5,其余依次类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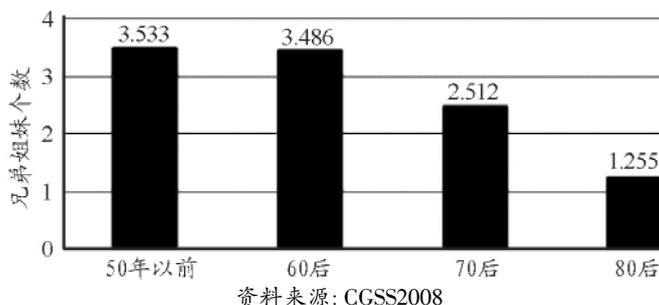
3.2 主要解释变量

兄弟姐妹数量(siblings):被访者哥哥(ob)、姐姐(os)、弟弟(yb)、妹妹(ys)之和。我们在此使用兄弟姐妹个数来代表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程度,计划生育政策原则上推行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

的政策,因此 80 后居民兄弟姐妹的数量直接代表了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程度。在本文选择的 80 后样本中 31.63% 为独生子女,远远高于总样本中 10.35% 的比例。同时我们根据图 1 可以看出,对于 1950 年以前出生的样本与 1960 年代出生的样本居民,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对其兄弟姐妹数量影响很小,兄弟姐妹个数的均值均在 3.5 左右^①;但是对于 70 后样本居民来说,初始建议型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 1980 年计划生育政策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后影响其弟弟妹妹的数量,因此兄弟姐妹个数的均值显著降低至 2.5 左右;80 后样本居民的兄弟姐妹个数的均值进一步的降低至 1.25。由此可见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独生子女数量显著增加、兄弟姐妹数量显著降低,使用兄弟姐妹数量来代理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指标^②。

图 1 计划生育政策对兄弟姐妹个数影响

Figure 1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d Number of Siblings



3.3 控制变量

幸福感作为个人主观情绪情感的体现和评价,除了受到上文提及的计划生育政策冲击之外,还会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这在国内外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因此本文设定控制变量如下:

第一类控制变量主要为反映被访者个体特征的因素,具体来说,主要包括:(1)性别,本文中以女性为参照组,设为 0,相应的男性为 1。通常而言,男女由于性别特征、社会角色、收入等方面的不同,使得男性和女性的幸福感存在一定的差异。很多研究幸福感的文献也得出了女性的幸福感往往高于男性的结论(Knight et al., 2009)。(2)民族特征,我们将汉族设为参照组 0,其他少数民族设为控制组为 1。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人群长期以来在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保持着自身民族的特色,民族差异往往会对个体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对自身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3)宗教信仰,将无宗教信仰者设为参照组 0。宗教能为现实的信教人士带来生活上的指引以及对来世的信仰,给人一种存在的确定性,对信教人群的幸福感知具有一定的作用。(4)中共党员身份,以非党员作为参照组设为 0,党员为 1。中共党员由于其特殊的政治身份和一些社会人缘资本,使得党员人群的主观幸福感程度相比其他非党员较高。(5)户籍状况,参照组为农村户口为 0,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城区等城市户口为控制组 1。在中国,社会经济资源的分配往往带有城市偏向性,城乡居民的社会福利状况存在较大的差距,这种状况的存在可能会一定程度上对居民生活的物质方面形成影响外还会对主观心理譬如幸福感造成影响。(6)婚姻状况,以未婚者为参照组设为 0,其他为 1。现有的一些研究表明,已婚人士对幸福的认可度往往高于单身及寡居人士(Stutzer and Frey,

① 对于 50 年代或 60 年代出生的居民来说,父母在 10 多年甚至 20 多年后再违背计划生育政策生孩子的概率比较小,因此计划生育政策对其兄弟姐妹数量的冲击较小。

② 虽然计划生育政策对居民的影响不仅限于兄弟姐妹的数量,但是从本文的研究目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否通过降低家庭子女数量、提高抚养质量的角度影响居民的幸福感知)出发,在此使用兄弟姐妹的个数来衡量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的冲击是较为合适的。

2006)。

第二类控制变量为与被访者人力资本相关的一些指标,主要包括:(1)教育年限,我们以被访者从小学开始,接受过的教育年数来衡量。通常而言,教育是增进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之一,并且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收入的提高也有比较显著地影响,因此教育可能通过收入从而影响个人的幸福感,也可能使个体对生活产生更高的期望而对幸福感产生作用(Carrieri and Paola 2012;)。(2)个人收入状况,以被访者职业收入的对数来表示。一般而言,个体的收入与个体的人力资本密切相关,且个体的绝对收入通常会影响到其主观幸福感。(3)相对收入,该指标反映了被访者家庭的相对经济地位,具体衡量来说,被访者家庭经济状况远低于平均水平取0,低于平均水平为1,平均水平为2,高于平均水平为3,远高于平均水平为4。(4)工作性质,我们以从事农业的劳动者为参照组。职业通常是造成个人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同时职业的不同还会使得身份不同,从而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作用。(5)住房状况,被访者若拥有产权的自有住房就设为1,其他情况为0。

第三类为反映被访者健康状况的指标。主要包括:(1)健康状况,我们设定被访者觉得自己身体状况很健康为1,其他为0。(2)不健康指标,若被访者觉得自己身体状态很不健康为1,其他为0。一些经验研究表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强烈地依赖于其健康状况(Borghesi and Vercelli 2012),进而影响其对自身幸福感的评价。

表1 80后及46~55岁年龄组样本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Post-80s and Age Group 46~55

变量	80后					46~55岁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happiness	999	3.924	0.905	1	5	1202	3.567	1.026	1	5
siblings	999	1.255	1.320	0	11	1202	3.757	1.842	0	10
edu	988	11.87	3.303	1	20	1058	8.480	3.144	1	18
lninc	887	9.237	1.094	5.011	13.82	1152	8.628	1.027	5.116	14.00
rela_inc	999	1.730	0.656	0	4	1202	1.438	0.746	0	4
male	999	0.474	0.500	0	1	1202	0.486	0.500	0	1
minority	999	0.077	0.267	0	1	1202	0.067	0.251	0	1
political	999	0.050	0.218	0	1	1202	0.122	0.328	0	1
huji	999	0.556	0.497	0	1	1202	0.493	0.500	0	1
religion	999	0.091	0.288	0	1	1202	0.090	0.286	0	1
work	999	0.566	0.496	0	1	1202	0.329	0.470	0	1
healthy	999	0.413	0.493	0	1	1202	0.165	0.371	0	1
unhealthy	999	0.008	0.089	0	1	1202	0.035	0.184	0	1
married	999	0.436	0.496	0	1	1201	0.930	0.255	0	1
house	999	0.643	0.479	0	1	1202	0.868	0.339	0	1

由表1描述性统计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80后一代还是46~55岁年龄组一代,幸福感的均值均超过3.5。这说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改善,居民的幸福程度也相对较高,“不快乐”与“很不快乐的”人较少。对于兄弟姐妹数量来说,每个80后平均有1.255个兄弟姐妹,与46~55岁年龄组兄弟姐妹均值3.757个相比,计划生育政策显著地控制了每个家庭孩子的数量,同时80后兄弟姐妹个数的均值也告诉我们计划生育政策并非完全有效。调研样本中,80后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87年,由此可见80后居民依然有很大部分受教育程度依然不高,高等教育或职业技术教育的普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在我国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80后样本宗教信仰虚拟变量的均值为0.091,基本与46~55岁年龄组持平。80后样本是否为党员的均值0.050显著低于46~

55 岁年龄组 0.122, 这是由样本的年龄差异造成的。对于 80 后居民的健康程度, 非常健康的均值远远高于非常不健康, 同时健康程度也远远高于 46~55 岁年龄组, 这与年轻人比中老年人更健康的常识也是相符的。对于虚拟变量是否有房, 80 后样本的均值达到 0.643, 虽然略低于 46~55 岁年龄组的均值 0.868, 但是已然显示超过半数的 80 后自有私房或已购房, 可见 80 后依然未完全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 对房屋的渴求依然是非常强烈的。

4 经验分析

4.1 实证结果

我们选择 Order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 使用排序 Probit 模型是由于我们所研究的幸福感数据具有从“很不快乐”到“很快乐”等五个等级的排序结构, 因此个体面临的选择结构具有天然的从低到高的特征(而多元 Probit 模型则会忽略数据内部的顺序结构, 从而使得估计结果有偏)。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我们不仅在列(1)汇报了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同时在列(2)~(6)中汇报了解释变量对居民幸福感的边际概率影响, 依次代表很不快乐、不算快乐、普通、还算快乐、很快乐。

回归结果显示, 兄弟姐妹个数对 80 后幸福感的影响为负且在 5% 水平下显著, 居民的兄弟姐妹数量每增加 1, 很不快乐、不算快乐以及普通的概率分别增加 0.2%、0.6% 与 1.3%, 很快乐的概率下降 2.2%。由此我们可以推断, 兄弟姐妹带来的资源分配与攀比效应的负向影响超过了血缘联系以及分担抚养压力所带来的正向影响。资源紧缺伴随着绝大多数 80 后的成长历程, 首先是物质资源, 80 后的幼年改革开放刚刚启动, 物质生活仅仅能够达到温饱水平, 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意味着生活质量的直线下降。其次是教育资源的紧缺, 80 后拥挤着上小学、初中、高中直至大学, 在山东、河南等高考大省高考甚至被形容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在一个教育资源紧缺的年代来自家庭的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 而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却意味着父母关注程度的相对降低。近年来则是房屋资源的稀缺, 伴随着 80 后进入结婚买房高潮的是房地产价格的飞速上涨, 如何获得买房首付的初始禀赋是困扰 80 后最大的难题之一, 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也意味着父母处可得资源的减少。无法获得自己渴求的资源, 再结合兄弟姐妹之间、同龄人之间的互相攀比, 直接造成了 80 后居民的幸福感知下降, 因此计划生育政策通过降低了兄弟姐妹个数的方式有效提高了居民的幸福感知。

对于其他变量, 我们发现家庭相对收入变量在 1% 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 人们不可避免将个人收入与其他人相比, 期望能够得到他人的认可与尊重。家庭绝对收入的影响却不显著, 这与张学志和才国伟(2011)的研究结论是不谋而合的, 他们认为, 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提高存在一个“拐点”, 但是由于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尚未达到“拐点”的收入水平, 因此在控制了相对收入的情况下, 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知的影响不再显著。

对于 80 后居民的健康水平, 我们发现变量很健康在 1% 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 如果居民的健康状况为很健康, 那么其幸福程度显著提高, 而很不健康对 80 后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可能与 80 后居民正处于青壮年时期身体状况较好, 即使不健康也是短期影响所致, 因此并不会影响到居民的幸福感知。

与女性相比, 男性的幸福程度更低, 男性很不快乐、不算快乐与普通的概率比女性高 0.7%、2.5%、5.5%, 很快乐的概率低 9.2%, 工作与事业上承担的沉重压力导致了男性的幸福感知往往低于女性。Stevenson and Wolfers(2009)也指出, 随着美国女性参与工作比例的不断上升, 女性幸福感知也随之下降, 从侧面验证了男性与女性相比较为不幸福很大程度上是工作压力过大导致的感受。

受教育年限、是否有工作虚拟变量、是否党员虚拟变量并不显著, 居民的收入水平往往体现了其受教育程度、工作情况以及政治面貌情况, 因此在控制了家庭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变量的情况下, 受教育年限、工作与党员的影响不再显著。

婚否、户籍、是否有房与孩子(女儿与儿子)数量并没有显著地影响 80 后的幸福感知。80 后尚属于

青年一代未达到三十而立的人生新阶段,对婚姻的渴望与单身自由生活的快乐并存,同时绝大多数 80 后还未承担结婚购房以及子女抚养、教育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因此上述 4 个变量对 80 后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 2 80 后幸福感回归结果

Table 2 Regression Results of Post-80 Generation's Happiness

	(1)	(2)	(3)	(4)	(5)	(6)
	回归系数	边际效果				
siblings	-0.070** (-2.00)	0.002* (1.78)	0.006* (1.96)	0.013** (1.98)	0.001 (1.02)	-0.022** (-1.99)
edu	0.003 (0.19)	-0.000 (-0.19)	-0.000 (-0.19)	-0.001 (-0.19)	-0.000 (-0.19)	0.001 (0.19)
lninc	0.067 (1.34)	-0.002 (-1.27)	-0.006 (-1.34)	-0.013 (-1.34)	-0.001 (-0.87)	0.021 (1.34)
rela_inc	0.298*** (4.36)	-0.007*** (-2.83)	-0.026*** (-3.87)	-0.057*** (-4.17)	-0.006 (-1.20)	0.096*** (4.39)
male	-0.288*** (-3.82)	0.007*** (2.58)	0.025*** (3.43)	0.055*** (3.75)	0.005 (1.07)	-0.092*** (-3.84)
married	0.134 (1.33)	-0.003 (-1.27)	-0.012 (-1.30)	-0.026 (-1.34)	-0.003 (-0.93)	0.043 (1.33)
political	0.223 (1.39)	-0.004 (-1.64)	-0.017 (-1.61)	-0.041 (-1.45)	-0.014 (-0.83)	0.076 (1.32)
minority	-0.027 (-0.17)	0.001 (0.17)	0.002 (0.17)	0.005 (0.17)	0.000 (0.25)	-0.009 (-0.17)
huji	0.103 (1.11)	-0.002 (-1.06)	-0.009 (-1.08)	-0.020 (-1.10)	-0.002 (-0.84)	0.033 (1.11)
religion	0.016 (0.13)	-0.000 (-0.13)	-0.001 (-0.13)	-0.003 (-0.13)	-0.000 (-0.11)	0.005 (0.13)
work	0.130 (1.54)	-0.003 (-1.42)	-0.011 (-1.50)	-0.025 (-1.53)	-0.002 (-0.91)	0.042 (1.56)
healthy	0.528*** (6.65)	-0.012*** (-3.50)	-0.044*** (-5.38)	-0.098*** (-6.48)	-0.019* (-1.94)	0.173*** (6.45)
unhealthy	-0.162 (-0.44)	0.004 (0.37)	0.016 (0.39)	0.031 (0.43)	-0.002 (-0.12)	-0.049 (-0.46)
house	0.059 (0.67)	-0.001 (-0.64)	-0.005 (-0.66)	-0.011 (-0.67)	-0.001 (-0.66)	0.019 (0.68)
son	-0.036 (-0.34)	0.001 (0.34)	0.003 (0.34)	0.007 (0.34)	0.001 (0.33)	-0.012 (-0.34)
daughter	-0.075 (-0.61)	0.002 (0.60)	0.006 (0.60)	0.014 (0.61)	0.002 (0.57)	-0.024 (-0.61)
N	876					

注:***、**、* 分别代表在 1%、5% 和 10% 水平下显著,所有估计均使用稳健的标准差,下表同。

4.2 进一步讨论

4.2.1 兄、弟、姐、妹的影响

兄弟姐妹的总数显著影响着 80 后居民的幸福感,但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对本人幸福感的感受

有所不同,因此我们继续使用 Order Probit 的方法分别对此进行研究,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列(1)、(2)、(3)、(4)、(5)分别为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以及综合考察的回归结果。变量哥哥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 1% 水平下显著,姐姐、弟弟和妹妹的影响并不显著,即随着哥哥的数量增加,样本居民的幸福程度显著降低。这可以从我国的“嫡长子”的宗法制度传统来解释,虽然传统的封建礼教制度已经废除,但是父母对儿子的偏爱依然是中国当前难以改变的传统,长子往往享有比其他兄弟姐妹更多的资源,哥哥的存在不但通过减少样本居民从父母处获得禀赋的方式影响样本居民的幸福感知,而且父母对哥哥的偏爱而导致的攀比效应使得样本居民的幸福感知进一步降低。对于样本居民的姐姐与妹妹,样本居民或者能从父母处获得更多的关爱(样本居民为男性)或者父母的关爱相对比较平均(样本居民为女性),攀比效应的降低可能是变量姐姐、妹妹并不显著的原因。而对于样本居民的弟弟来说,虽然弟弟作为男性可以从父母处获得较多的禀赋,但是相对来说弟弟比较年幼,样本居民对弟弟的关爱之情降低了可获得资源减少以及攀比带来的负效用,因此变量弟弟并未如哥哥那样对样本居民幸福感知有显著为负的影响。

表 3 80 后幸福感知回归结果: 兄弟姐妹的影响

	(1)	(2)	(3)	(4)	(5)
ob	-0.147*** (-2.58)				-0.166*** (-2.84)
os		-0.011 (-0.22)			-0.012 (-0.23)
yb			-0.030 (-0.37)		-0.069 (-0.84)
ys				-0.052 (-0.77)	-0.078 (-1.11)

注: 控制变量同表 2, 出于篇幅在此并没有汇报回归系数。

4.2.2 46~55 年龄组幸福感知——侧面视角的分析

计划生育政策的冲击不仅对 80 后居民的幸福感知造成了影响,同样影响了在 1980 年以后进入生育女期的居民,因此我们同时选择 46~55 岁之间的居民作为样本进行侧面视角的分析,原因有两点:首先,46~55 岁的居民不但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冲击,而且按照年龄来说,基本是 80 后的父母一代, Knight and Gunatilaka (2009) 指出,幸福是可以传染的,因此幸福感知可以在子女与父母之间交互传染;其次,46~55 岁一代是经历较为丰富的一代,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运动、计划生育、改革开放、国有企业员工下岗分流、养老金账户赤字等一系列的冲击,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代。在样本调查时期,这代人已步入中年晚期甚至老年,而计划生育政策显著降低了其子女数量。因此,我们在此使用 46~55 岁居民子女的数量来代理计划生育政策对其冲击程度,没有儿孙满堂承欢膝下的他们幸福感知是否显著降低了呢?

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其中列(1)为孩子总数,列(2)为儿子数量,列(3)为女儿数量,列(4)为综合考察。研究表明孩子数量的增加并不能显著提高 46~55 年龄组居民的幸福感知,变量儿子数量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但是变量女儿数量却在 10% 以上水平显著且符号为正。这是因为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孩子的增加虽然能够给中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带来更多的保障与乐趣,但是同样需要为孩子尤其是儿子的婚姻大事、经济状况操心,在两种效应的综合因素下孩子数量尤其是儿子数量的增加并没有带来中老年人幸福程度的改善,反而女儿能够给老人带来更多的幸福感知。

表 4 46~55 年龄组幸福感回归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Happiness of Age Group 46 - 55

	(1)	(2)	(3)	(4)
children	0.058 (1.13)			
son		-0.065 (-1.18)		-0.012 (-0.19)
daughter			0.112** (2.26)	0.107* (1.88)
edu	0.010 (0.73)	0.008 (0.57)	0.011 (0.78)	0.011 (0.77)
lninc	0.163*** (3.56)	0.156*** (3.50)	0.167*** (3.68)	0.167*** (3.66)
rela_inc	0.472*** (8.02)	0.467*** (7.91)	0.471*** (7.99)	0.470*** (7.99)
male	-0.009 (-0.12)	-0.004 (-0.06)	-0.010 (-0.13)	-0.009 (-0.13)
married	0.380*** (2.77)	0.395*** (2.89)	0.383*** (2.79)	0.384*** (2.80)
political	0.133 (1.33)	0.136 (1.36)	0.136 (1.36)	0.136 (1.36)
minority	0.145 (0.93)	0.164 (1.05)	0.155 (1.01)	0.157 (1.02)
huji	-0.021 (-0.22)	-0.080 (-0.85)	-0.040 (-0.45)	-0.045 (-0.47)
religion	-0.012 (-0.10)	-0.000 (-0.00)	-0.019 (-0.15)	-0.018 (-0.15)
work	0.015 (0.19)	0.016 (0.20)	0.016 (0.20)	0.016 (0.20)
healthy	0.429*** (4.50)	0.435*** (4.51)	0.426*** (4.47)	0.426*** (4.47)
unhealthy	-0.661*** (-2.82)	-0.687*** (-2.96)	-0.674*** (-2.90)	-0.677*** (-2.90)
house	0.195** (1.99)	0.204** (2.09)	0.193** (1.98)	0.194** (1.99)
N	1018	1018	1018	1018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居民的幸福感知为考察对象,使用居民的兄弟姐妹个数代理计划生育政策对居民的影响,在CGSS2008数据的基础上,研究了计划生育政策与80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显著地降低了80后居民的幸福程度,这很可能是由于家庭资源相对紧缺以及攀比效应造成的;在兄弟姐妹之中,哥哥往往占有更多的家庭资源,因此哥哥对样本居民幸福水平降低的影响最为强烈;对于80后父母一代的中老年人,女儿而非儿子提高了其幸福感。由此可见,计划生育政策通过控制80后居民的兄弟姐妹个数而提高了其幸福感,同时没有降低80后父母一代中老年人的幸福感。因此在以提高居民幸福程度为核心目标的和谐社会建设中,计划生育政策做出了一定的

贡献。

当前,在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龄化社会逐渐逼近的大环境下,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开同样需要考虑居民的幸福感知的问题。基于本文的研究,我们认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开与改革应当注意以下两点:

(1) 计划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数量大幅增长的同时,应该采取有效的配套措施提高人口的质量。随着我国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全面提升人口素质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环节,由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发达国家发展的实践可知,包括人口素质提高在内的人力资本积累是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与此同时,我国的教育也应该由应试型教育逐渐转变为素质教育,教育成为助推人口素质提高的重要媒介。在教育成本高企的情况下,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减缓人口的大规模增长从而为人口的受教育渠道提供了便利。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国学龄儿童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文盲人数大幅下降,较高的人口素质为改革开放 30 年来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人才与智力支持。但现阶段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是,城市的出生意愿要低于农村地区,但比较优质的教育资源却集中在大城市,造成城乡学龄儿童所接受教育具有较大的差距,这在客观上加大了农村地区的贫穷与社会阶层的固化,不利于全社会总人口质量的提高。

(2) 缓解性别比例失调,不仅可以减缓人口比例失调带来的社会管理问题,还对人口的均衡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受传统“养儿防老”观念以及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的影响,重男轻女的现象在我国很多地区还比较普遍,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管理问题,特别是考虑到本文的研究也显示女孩反而能够给老人一个更加幸福的晚年,这就更加说明了性别比例的均衡还会对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知起到积极作用。因此,在未来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要更加重视人口质量的提升。人口质量不仅包括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性别结构的均衡也应是题中之意。综上所述,未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坚持控制人口大规模增长的基础上,还应当兼顾男女比例平衡的问题,以缓解性别比例失衡带来的问题。具体来说,主要的政策包括: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实现全民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杜绝产前性别鉴定等非法行为,使“失踪女孩”的现象不断减少。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 经济研究, 2010; 4: 4-13.
Cai Fang. 2010. Demographic Transition,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Lewis Turning Point in China.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4: 4-13.
- 2 李建新. 七、八十年代中国生育政策的演变及其思考. 人口学刊, 1996; 1: 47-52.
Li Jianxin. 1996. Evolution of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n the 1980s. *Population Journal* 1: 47-52.
- 3 王诚. 劳动力供求拐点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 中国人口科学, 2005; 6: 2-10.
Wang Cheng. 2005. Lewis Turning Point and Chinese Transition in Dual Economy.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6: 2-10.
- 4 王丰, 梅森. 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因素. 中国人口科学, 2006; 3: 2-18.
Wang Feng and Andrew Mason. 2006. The Demographic Factor in China's Transition.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3: 2-18.
- 5 张学志, 才国伟. 收入、价值观与居民幸福感知——来自广东成人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管理世界, 2011; 9: 63-73.
Zhang Xuezhi and Cai Guowei. 2011. Revenue, Social Value and the Happiness of Resident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dults Survey in Guangdong Province. *Management World* 9: 63-73.
- 6 周俊山, 尹银.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金融研究, 2011; 10: 61-73.
Zhou Junshan and Yin Yin. 2011. Impact of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on Saving Rate: Evidence from Provincial

- Panel Data.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10: 61 – 73.
- 7 Bongaarts, J. and S. Greenhalgh. 1985. An Alternative to the One – Child Policy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1(4) : 585 – 617.
 - 8 Borghesi, S. and A. Vercelli. 2012. Happiness and Health: two Paradoxe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6(2) : 203 – 233.
 - 9 Carrieri, V. and M. De Paola. 2012. Height and Subjective Well – being in Italy. *Economics & Human Biology* 10(3) : 289 – 298.
 - 10 Chu J. 2001. Prenatal Sex Determination and Sex – selective Abortion in Rural Central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7(2) : 259 – 281.
 - 11 Ebenstein, A. 2010. The Missing Girls of China and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the One Child Policy.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5(1) : 87 – 115.
 - 12 Edlund, L. , H. Li, J. Yi and J. Zhang. Sex Ratios and Crime: Evidence from China. Mimeo, 2009.
 - 13 Knight J. and R. Gunatilaka. 2009. Is Happiness Infectious? Oxford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 446.
 - 14 Knight, J. , L. Song, and R. Gunatilaka. 2009. Subjective Well – being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4) : 635 – 649.
 - 15 Li, J. 1995. China’s One – Child Policy: How and How Well Has it Worked? A Case Study of Hebei Province, 1979 – 88.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1(3) : 563 – 585.
 - 16 Rosenzweig, M. R. and J. Zhang. 2009. Do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ies Induce Mor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Twins, Birth Weight and China’s ‘One – Child’ Polic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6: 1149 – 1174.
 - 17 Stevenson, B. and J. Wolfers. 2009. The Paradox of Declining Female Happines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1(2) : 190 – 225.
 - 18 Stutzer, A. and B. S. Frey. Does Marriage Make People Happy , or do Happy People get Married. *Journal of Socio – economics* 2006, 35(2) : 326 – 347.
 - 19 Yang, D. and D. Chen. 2004. Transformations in China’s Population Policies and Demographic Structure. ?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9(3) : 269 – 290.

(责任编辑: 沈 铭 收稿时间: 2012 – 11)